

□ 哈佛燕京圖書館書目叢刊第八種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札
七百通考釋 一

● 陳智超 著

安徽大學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基金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
資助出版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札 七百通考釋 一

● 陳智超 著

● 安徽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代徽州方氏親友
手札七百通考釋 / 陳智超著. - 合肥: 安徽大學出版社,
2001. 12

ISBN7 - 81052 - 442 - 9

I. 美… II. 陳… III. 方用彬 - 家族 - 書信 - 考證
IV. K820.948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1)第 083154 號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札七百通考釋

陳智超 著

出版發行	安徽大學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 3 號 郵編 230039)	經銷	新華書店
聯系電話	總編室 0551 - 5107719 發行部 0551 - 5107784	印刷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印刷廠
電子信箱	ahdxchps@mail.hf.ah.cn	開本	850×1168 1/32
責任編輯	彭君華	印張	68.125
封面設計	孟獻輝	字數	1200 千
		版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 - 81052 - 442 - 9/K·37

定價(全三冊) 190.00 圓

如有影響閱讀的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出版社發行部聯系調換

作者簡介



陳智超，廣東新會人，一九三四年生於上海。高中畢業後在雲南邊疆從事公路建設多年。一九五七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一九六二年畢業後考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前身）歷史研究所為研究生。畢業後留所工作，歷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直至退休。一九八二年起，先後在法國、日本、美國、加拿大各著名大學及研究機構作客座教授、訪問學者。研究領域涵蓋宋至清初歷史、歷史文獻學、史學史、中外關係史等。專著及主編之學術資料集有《解開宋會要之謎》、《宋會要輯稿補編》、《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第三卷、《旅日高僧東臯心越詩文集》、《日本黃檗山萬福寺藏旅日高僧隱元中土來往書信集》等十餘種，發表論文百餘篇。現正從事《舊五代史》輯本的重新整理工作。

著作出版推薦意見書

一

本書是一種高水平的系列傳世明代信札考釋集。經過考釋者陳智超先生的整理、考釋，哈佛燕京圖書館的一份特藏品，成了一冊很有價值的史料集。其重要的學術意義，主要可以提到以下幾點：

一、提供了一批可以現成利用的有價值的史料。自從史學界明確認識二重證據、多重證據法後，就自覺地不斷擴大漢文古籍以外史料的發掘和應用，以完善自己的研究。本書適應了這方面的需要。考釋者所做的工作，澄清了原著錄的模糊性，推翻了已出現的謬說，使信札的字迹和所涉及的時間、地域、人物、事件都顯豁起來，信札的史料價值纔能發揮出來。其中收信人的確定，收信人和信札寫作的時間、反映的地點問題的解決，可說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信札從整體上反映出嘉靖末至萬曆中徽州一位儒商的社會相、他廣泛的社會聯繫，結合徽州商人資本的活躍、收信人士商兩兼的身份地位、所處的明末社會大變動前期這個時間，完全應該相信，信札確實『具有很高的和多方面的文物和史料價值』。

二、考釋謹嚴、準確，提供了一系列研究方法的範例。特別是考釋者堅持『金針度人』

原則，將證據、方法，包括論證過程全部展示出來，顯得更更是多姿多彩，美不勝收。追查收信人確切姓名、生平的全過程，從懷疑、提出問題，到得出全新的結論，解決問題，展示了中國考據的一個完美的典型。中國傳統史學和新史學有豐富的考據應用實踐，乾嘉學術且以考據爲名突出其成就，本書每一通信札的考釋都表現了中國考據學的功力和科學魅力。但是，中國考據學缺少足夠的提煉、概括，缺少專門的理論著作，本書在這方面有所表現，總結出『有罪推定』原則和多種證據、連環互證原則，是考據學的部分理論升華。因此，本書的方法論價值，較之其史料價值毫不遜色。

三、本書出版，將更加鼓勵和推動學術界、出版界發掘漢文古籍以外史料的工作，使這方面工作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推薦人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何齡修

二〇〇〇年七月六日

二

陳智超先生所著《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札七百通考

釋》，將一批珍貴的明人手札發掘出來，公諸於世，實為中外學界的一件幸事。美國所藏這批明人手札，乃係原件，既屬稀見文物，又為珍貴史料，堪稱徽州文書之一寶藏。其不僅數量可觀，屬海內外罕見；而且內涵豐富，涉及明代後期這一變革時代的許多方面。又收信人多為同一人，本係徽州儒商，更具典型意義，研究價值極高。尤其可貴的是，作者歷經多年時光，搜集大量有關資料，旁徵博引，對這批利用難度極大的手札進行了全面考釋，為他人進一步利用這批資料做了必不可少的奠基性研究工作。發掘與考釋史料，實為史學的基礎性研究，不可或缺。如果對有關史料的時間、地點、人物都沒有弄準確，連最基本的史實都沒有搞清楚，就去做進一步的研究，引發各種結論，是很容易滑向唯心史學泥潭的。而要能對史料作出翔實準確的考釋，亦必須得法。作者在本書寫作中所遵循的『有罪推定』、『金針度人』、『連環互證』等原則，可以說是對史學考證方法的某些概括與總結，更值得仔細體會和認真學習。本書考證縝密，議論精當，功力深厚，足可傳世，非一般急就篇可比。本書的出版，對方興未艾的徽學研究，乃至明清社會變遷的探索以及其他相關研究，都有重要意義。

推薦人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樂成顯

二〇〇〇年七月十一日

單位學術委員會評審意見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札七百通考釋》，是一部關於明代信札的考釋集。這批明人手札，既屬稀見文物，又為珍貴史料，堪稱徽州文書寶藏之一，而過去不僅沒有得到利用，甚至沒有得到正確的認識。手札數量可觀，而且內涵豐富，屬海內外罕見，反映了明代後期社會變遷過程中社會生活的多方面內容。考釋者的考釋是以大量史料為基礎，考釋嚴謹準確，並採用諸多研究方法，將多種證據連環互證等方法，原則有機地結合起來。本書的出版將會推動學術界進一步注重發掘利用傳統文獻資料，對徽學乃至明清社會變遷等問題的研究，都提供了重要資料。

此成果著作權不存在爭議。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副主任 辛德勇

二〇〇〇年七月二十六日

導 言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是北美大學中收藏中國古籍最豐富的圖書館，館藏中有一些是珍貴的文獻。七百餘封明人手札是哈佛燕京圖書館最珍貴的館藏之一，可以說是該館的鎮館之寶。本書就是對這批手札的研究與考釋。

這批手札有確切年代可考的，最早一通寫於嘉靖四十三年（一五六四），最後一通作於萬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歷時三十四年，相當於十六世紀的最後三分之一世紀，離現在已經四百多年了。絕大部分信札的收信人爲同一人，現在已經可以確定，他姓方，名用彬，字元素，是徽州府歙縣人。方氏是歙縣以至徽州的大姓之一。寫信者有四百餘人，包括方氏宗族，方用彬的親戚以及各地的友人，其中包括相當數量有名的文人。這批手札的確切數字是信函七三三通，名刺一九〇通，賬單一件，書名作『手札七百通』，是舉其成數。

信札經過裝裱，分訂爲七冊，各冊封面右上角分別標有日、月、金、木、水、火、土字樣。日冊收信函一〇六通，月冊一一六通，金冊一六一通，木冊七二通，水冊六二通，火冊一一九通及賬單一件，土冊信函九七通、名刺一九〇通。館藏目錄中冠以《明諸名家尺牘》的總名。

一

這批四百多年前的手札所以能保存下來并流傳到哈佛燕京圖書館，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

首先，收信人方用彬有意識地收集和保存了這批手札。在金冊第九函之後，有收信人識語一篇，談到他收藏信札的經過。他說：『余昔弱冠，志在四方，蓋欲縱觀山水，廣結英雋。間有交游文酒會，每得翰墨，輒藏之，永以爲好也。』又說：『余自少迄今三十餘載，所游南北京省，歷覽名勝而交諸文士大夫，結社題咏及往來書翰，不啻盈幾篋矣。久之，慮將湮沒爲蠹魚殘食，於是興懷感事，遂檢點分類校定。其束牘詩詞，凡文字俱妙者，裝爲數帙；其短刺手札，簡約精絕者，亦裒成數帙；至夫禮請辭謝之帖，皆名公高士之諱，猶不可棄，亦編成集……異時傳諸後代，使之知余生平重交誼、寶翰墨之諄切也如此，宜深念之，當保惜之。』寫這篇識語的時間是『萬曆庚子歲臘月餘日』，萬曆庚子歲爲萬曆二十八年，相當於公元一六〇〇年，但因中西曆的差異，該年臘月已進入一六〇一年了。末署『世儒生方思玄直叙書於竹林園之清音閣中』，不是方用彬。我曾懷疑這篇識語以及下面一篇吳期祚識語的真實性，經過多方考證，可以認定它確是收信人方用彬親筆寫的識語，可見他又名思玄。詳見本書第二篇《方用彬及其親友》。

其次，這批手札劫後餘生，爲方用彬的孫子及外曾孫所保藏。在上冊第二八三通名刺之後，有方用彬外曾孫吳期祚的識語一篇，他寫道：『予曾外祖太學用彬公，字元素，有明慶、曆人。迹其生平，博學能文，胸無今古，其一時所欽爲賢豪間者耶。及余外祖明齡公，率由舊章，遵先遺憲，誠疇昔隱逸君子焉。曾集詩文翰牘，匯成六冊，以爲家珍而貽後嗣。厥後余宸臣二舅父暨諸侄輩家移海陵，故里舊物，忽被賊散，余二舅父概不之惜，獨寤寐不忘者，此元素公遺冊耳。閱丁巳冬，余母代檢賊剩殘書，附鴻函出，他俱烏有而遺冊僅全，余二舅父不啻百朋之錫。』末署『康熙戊午花朝日澄溪愚外孫吳期祚拜識於南梁之萍舟』。隨着歙縣環巖《方氏族譜》的發現，這篇識語中提到的明齡、宸臣的身份都得到證實，從而證明了這篇識語的真實性。據《方氏族譜》，方用彬的次子名明齡，字道卿；明齡有三子，次子名夢周，字宸臣。族譜例不載女兒名字，吳期祚稱宸臣（夢周）爲二舅父，明（他寫作『明』）齡爲外祖，可知明齡有一女嫁吳氏，爲期祚之母。夢周舉家由原來居住的歙縣巖鎮遷至海陵（海陵爲今江蘇泰州的舊稱，但從識語所述語氣，海陵似距歙縣巖鎮不遠，可能爲附近一小地名，也可能是休寧舊名海寧的筆誤），故居被劫，方用彬的信札爲劫後遺物。康熙戊午爲十七年，公元一六七八年，丁巳爲其前一年，一六七七年，距方用彬寫識語時已有七十七八年，并已改朝換代了。

以後這批手札的綫索一度中斷，至遲於十九世紀末流落到了日本。這七冊手札，每冊封面都鈐有『鈴木煙雲藏書之記』，封裏則鈐有『鈴木氏』、『樂山堂文庫』等藏書印。哈佛燕京圖

書館還藏有日本書畫家玉置環齋編的《明諸名家尺牘人名略錄》七冊，每冊與上述七冊信札相對應，考證寫信人姓名及簡歷，但錯誤甚多。《略錄》有玉置環齋寫的跋語：『雲寶鈴木君頃獲有明四百八十餘名尺牘十襲，珍愛不啻，乞余舉其傳……因就諸書得其傳者附之姓名下，未得者姑虛位以待他日。』寫識語的時間是『明治乙酉三月』，相當於公元一八八五年，清光緒十一年。識語說『頃獲』，可見鈴木雲寶（煙雲）收藏這批信札在此前不久，樂山堂文庫應是鈴木氏的文庫。識語說是十襲，現在看到的是七冊，有可能這批信札經過鈴木的改裝，由十冊變為七冊，或是遺失了三冊，或是玉置的筆誤，將『七』誤寫為『十』。玉置的跋語在吳期祚識語之後二百餘年，這期間手札的命運及它如何流落到日本的情況，日本友人杉村英治先生曾幫助我在日本多方查找綫索，至今還沒有得到答案。

最後，它們於上世紀中葉入藏哈佛燕京圖書館。這批信件每冊都鈐有中英文的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書印，英文藏書印標明的日期是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日，這是它們正式入藏之日，距今也將近半個世紀了。哈佛燕京圖書館自成立以來，就以它雄厚的資金收購大批中國古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不少故家將家藏的中國古籍出賣，裘開明館長兩度赴日，選購了不少善本古籍。這批手札之所以會由日本流至美國，也就不難理解了。

我從一九九七年七月至一九九九年五月在哈佛大學作訪問學者。在這將近兩年中，我的大部分時間都從事於研究這批方氏手札，而且這種研究一直持續到現在。哈佛燕京圖書館珍本、善本不少，在這裏看書，如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爲甚麼我要付出這樣大的精力去研究這批信札呢？這是因爲經過反復比較，我認定它具有很高的和多方面的文物和史料價值，而且這些價值只有通過深入細緻的研究才能充分地發掘出來，爲人們所利用。隨着研究的步步深入，我的這種認識愈加堅定。正是有了這種認識，才使我有勇氣去克服研究過程中不斷出現的種種意想不到的困難。

具體來說，這批信件的價值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這是到目前爲止，已知的數量最大的一批明人信札。收藏明人手札之富，過去首推上海圖書館，數量爲五百餘通，而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爲七三三通，比上圖多百分之四十以上。現代化生產講究規模生產，作爲研究資料，除少數有特殊價值者例外，也只有達到一定規模，才能形成氣候。試想，舉世聞名的商代甲骨文、漢簡、敦煌文書、明清檔案，以及徽州文書，如果不是達到現在這樣的規模，就不可能形成甲骨文、敦煌學等專門學問，也不可能對推動相關學科的發展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這批明人手札的規模雖然不能同上述幾種資料

相比，但就同類資料而言，它是數量最大的一批，而且也達到相當大的規模。

第二，收信人基本上爲同一人。在所有七三三通信函中，上款爲元素者有二〇八通，夥江者一四一通，蘭皋者一一通，無上款者二二八通，其他一四六通。現在已有確鑿證據證明（詳本書第二篇《方用彬及其親友》），夥江、蘭皋都是方用彬的別號，無上款者絕大多數也是寫給方用彬的信。按最保守的估計，寫給方用彬的信，佔這批信件之百分之八十以上。即使是那些寫給別人的信，也同方用彬有關，否則不會由他保存。同樣數量的信札，收信人爲同一人，抑或是不同的、不相關的若干人，它作爲研究資料的價值就相差很遠。

第三，與文集中所收書信相比，它具有更高的原始資料的性質。書信作爲文體的一種，在我國有悠久的傳統。司馬遷報任安書，李陵答蘇武書等，都是傳誦千古的名作。相當一部分流傳下來的文集，也收入了作者的書信，有些甚至達到了相當的數量。但是文集所收的書信，一是經過編者的選擇，篩選了許多編者（有些就是作者本人）不願意或認爲不值得流傳，而對後來的研究者非常有用的信件；而這批信件雖然也經過作者的選擇，但保留的目的不是要刊行，所以標準較寬。特別是火冊所收關於借貸往來的書信，與方用彬所寫識語的初衷不相同，原來不一定打算保留，但對後來的研究者却很有用。二是文集所收書信，一般都經過文字加工，刪削了上下款及編者認爲不需或不宜保留的文字；而這批信件却是全文、原件保留下來了。三是文集所收書信是以寫信人爲中心；而這批信件則是以收信人爲中心。

第四，它帶有鮮明的時代、地區和個人的特點。十六世紀下半葉是中國社會發生巨大變化的時代。儘管學者們對這種變化的性質有不同的解釋，如究竟是不是資本主義萌芽等等，但發生變化却是公認的事實。徽州地區又是在這場變化中一個有典型意義的地區，此時徽商更爲活躍，士商之間的關係更爲密切，有人稱之爲「士商互動」。收信人方用彬更是身跨士、商兩界的人物，我給他定位爲儒商。總之，他是一位在變化時代典型地區的典型人物。他在社會上的地位處於中層，既非達官、貴人、豪富，也不是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勞動大眾，他的交游相當廣泛。以這樣一種類型的人物爲中心的資料，尚不多見。

第五，它的內涵相當豐富。寫信或通名刺的，共有四百八十餘人。其中有全國性影響的文人，如王世貞、汪道昆，有抗倭名將戚繼光，有明朝宗室，如八大山人的祖父朱多炆，有各級官員，有方氏宗族成員，有當時著名的書家、畫家、篆刻家、墨工等等，也有一些不知名的落魄文人。地區則包括北南兩京，南至廣東，西至湖廣，東至蘇杭。從信的內容來說，有文人間吟詩結社，有書畫鑒定，有生意買賣或借貸，有宗族祭祀、修譜等活動。

三

雖然這批書信有巨大的價值、豐富的內容，但要能爲人們所利用，還有許多障礙。我寫作這部《考釋》的目的，從某種意義來說，就是幫助人們克服這些障礙。我所做的工作可以用

『五認』來概括。

(一) 認字

一般來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後出生的文史工作者，大量接觸的是雕版或排印的文字，對辨認書信的行書、草書或潦草、獨特的字體，已有相當困難。更不用說當今的中青年學者，相當一部分已不是用筆而是用電腦來寫作，困難更大。至於外國研究中國文史的學者，已很少有人能直接閱讀中國古代的書信。如果連字都不能認識，何談利用？所以我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認字，作出釋文，并且原文照錄。當然，我也沒有全部認出，也不能保證釋文絕對沒有錯誤。我的辦法是，盡量找同行一起討論，實在認不出的，在釋文中作空圍，讀者有疑問的可以隨時對照書信影印件（第三冊）。如果讀者能認出空圍中的字，或改正釋文的錯誤，請及時告知，感激不盡。

(二) 認人

認人的『人』，包括收信人、寫信人和信中提及的人。關於如何確認收信人方用彬的問題，將在下節中專門討論。

這批信札的寫信人可分為兩類：一類只是通名刺的，都用正楷書寫，姓名俱全；另一類是寫信的，其中一部分姓名俱全，且易辨識，但相當部分或雖書姓名而難以辨認，或只具名而不書姓，或姓名俱無，末尾只書『名正肅』等等，而載有姓名的『正帖』又沒有保留下來。

所以認人的工作分幾個步驟或幾種情況。對於姓名俱全而且容易辨識的人，要確定他的身份及與收信人的關係，避免誤認。如陳萬言、沈津等，約略同時就有同名的兩人。結合信件內容及方用彬的情況，可以確定寫信的陳萬言是曾任御史、號海山的廣東南海人陳萬言；沈津是曾任黟縣知縣、號玉壺道人的浙江慈溪人沈津。姓名雖全而字迹不易辨認的就要準確認字，避免誤認。因為姓名和書信內容有區別，信文中有個別字難認，有時還可結合上下文意來推測、辨認，姓名之間沒有必然聯繫，無從推測。有名無姓的寫信人，辨認起來更困難，因為異姓而同名的人比同姓名的人要多得多，單名者更是如此。前述日本玉置環齋的《人名略錄》考證多誤，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有名無姓的人，他往往在工具書中找到一個同名的人就加以認定。辨認有名無姓的寫信者，要運用多種手段。如『元聲』，就是從鈐在信上的印章及其他信的內容知為旌德知縣樂元聲；『昌先』，就是從信的內容知為王世貞的外甥曹昌先；『成』，從筆迹對比知為歙縣的汪大成。至於無名無姓者，只能從筆迹、內容、印記等多方面綜合判斷，才有可能得到答案；當然，也可能無法得到答案。

總之，認寫信人的工作，無名無姓或有名無姓的要確定其姓名，有姓名而難認者要準確辨認，即使認出姓名還要注意避免與同姓名者混淆。所有寫信人，都要盡量確定其身份，了解其簡歷及其與收信人方用彬的關係。至於這些原則的具體運用，在有關信件的考釋部分都有說明。到目前為止，四百八十餘名寫信人中，已確定其身份者約有百分之八十。對於四